

4 / 1992

- 沙石峪四十年
- 记国民党政务督察团在河北
- 太行人民打蝗记
- 我的蓝天生涯
- 宋美龄的最后岁月

河北文史资料

“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夺高产。”这是60年代中期国人崇尚的时代精神。本期《共和国足迹》栏目中，刊登张贵顺《沙石峪四十年》一文，生动地记述了沙石峪人民改天换地、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领袖足迹遍古城》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我省保定的革命实践，很值得一读。在《史海存真》栏目中几篇文章，都是作者亲身的珍贵回忆，其中《太行人民打蝗记》不失为一篇好史料。今天的青年人已不大了解旧社会蝗灾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此文生动地记述了在那艰苦的岁月，共产党不仅领导人民战胜“人祸”，也同样战胜“天灾”的壮丽画卷。《回首往事》栏目中，发表一组关于抗美援朝的回忆文章，其中著名空军战斗英雄刘玉堤的《我的蓝天生涯》向读者叙述了他由一名普通战士到出色飞行员的成长过程，值得广大青年朋友一读。《工商史综》栏目中刊登的两篇史料，在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可供参考。

《河北文史资料》1980年创刊，已经走过12个年头，本刊共刊出43期，向读者提供了约650万字的史料。为了适应文史资料工作深入发展和广大读者的需要，从1993年开始，本刊更名为《文史精华》。坚持文史资料特色，坚持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是本刊工作的方针；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史资料精品，是本刊的追求。我们将以开拓进取的精神，以扎扎实实的敬业作风编好《文史精华》，诚望得到新老读者朋友的支持、关怀与帮助。

编

者

絮

语



河北文史资料

目录

EA56/30

●共和国足迹

沙石峪四十年

张贵顺(1)

领袖足迹遍古城

范秀莲(48)

●史海存真

解放前夕民革南京分会反蒋斗争纪实

胡勤业(55)

记国民党政务督察团在河北

陈开国(68)

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片断经历

胡开明(85)

千里挺进大别山的点滴回忆

胡勤祥(94)

太行人民打蝗记

袁毓明(103)

●回首往事

我的蓝天生涯

刘玉堤(127)

回忆抗美援朝最后一战

王明柱(138)

我在朝鲜战场搞后勤

呼金岭(144)

在保定见到的“九·一八”和“一二·九”

唐铁田(14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办

总编:李秉新 副总编:徐俊元 石玉新

总第四十三期

1992年第4期

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回忆 王念基(152)

●工商史踪

民国年间滦县商家的经营之道 徐 贵(160)

旧时遵化商人的生意经 李仲山(166)

●旧时省情

孙连仲时期的河北行政 谢天培 卜青芳(177)

抗战时期河北伪政权的区划沿革
李振龙 徐振安(187)

●文 摘

宋美龄的最后岁月 凌三发(192)

●补 白 邓小平跟着黄包车进南京(54)宋哲元病歿绵阳(159)唐山华新纱厂与日本人合办经过(176)冯玉祥“给鞋敬礼”(191)

责任编辑:杨小波 谢凤英 靳迎春
封面设计:宋丕胜

沙石峪四十年

● 张贵顺

古老神话《愚公移山》流传了几千年，终归到公元 20 世纪，在我们新中国才变成活生生的现实。1963 年东生同志写的那本书《看愚公怎样移山》跟广大读者见面以来，沙石峪在全国出了名，被人赞誉为“当代愚公”。村里北山坡竖起刻有“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14 个红字的石碑，曾吸引五大洲 157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界朋友参观、访问，并摄影留念。作为沙石峪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的历史标志，它时刻提示沙石峪人牢记周总理的关怀和嘱托，把山乡建设办得好上加好。由 50 年代到 70 年代，我们靠自己的双手，三次重新安排九岭山水，把原来贫瘠落后的穷山沟，改造成处处花果园，道道米粮川。祖祖辈辈愁虑的生活温饱基本解决了。跨入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春潮涌进这里的山圈儿，我们不失时机调整产业结构，一方面坚持增产粮食，一方面充分利用本地自然条件，下大力气发展林业，新培植果树 3 万棵，并办起一系列工副业，从青石板上打通开发商品经济的新路。到 90 年代，为争取提前奔小康，向科技兴农要效益；1990 年粮食总产突破 50 万公斤，工农业总产值已达 197 万多元，连续 5 年全村人均收入超千元。实现了 1966 年周总理第一次视察后制订的沙石

峪远景规划：“山上松柏戴帽，山间果树缠腰，山下千亩千斤水浇田，粮果总产双百万。”

穷 则 思 变

穷，刨刨底儿，总要有根。

相传一百多年前，遵化县尹家台村有个穷汉，名叫李老二，为人正直，因打抱不平，得罪了从北京下来的一个催粮官，官府衙门到处张贴告示，要满门抄斩。李老二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携全家潜逃到“狼窝”（指沙石峪）避难。

这地界，可说是“穷山恶水”，群山环抱中间横卧的长脖岭把山圈分成两条沟，整个地貌象个石头盆子。沟谷里怪崖林立，常有狼群出没。当李老二发现山缝石层夹挤着星星点点的红土，他高兴地噙着泪花，扬起一双颤抖的手，仰面长叹：“天不灭我！”于是把全家安置在山下，住进石板窝棚，从此，这里才有了人烟。后来，交不起租子的，还不上欠债的，遭灾倾家荡产的，流浪在外的，陆陆续续往这里投奔，刨石搜土种庄稼。

多少年的煎熬，多少年的跌撞，这聚居七八十户的小山村，仍穷得连个庄名都没有，外村一直管它叫“大狼峪（现在叫大老峪）北沟”，本村也随口自认了。按户数统计，当时贫雇农占全村的87%，而70%土地归一户地主和一户富农所有，剩下的大都属于富裕中农和中农户了。地主坐镇外村，村里有富农给当狗腿子。因为在他们看来，穷山沟哪是人住的地方呢。

人们按照祖上的传统，没有土地就叠起石坝，拦住水土；没有树木，就挖个石坑，找些山皮土栽上耐干旱的枣树、核桃树；阳坡低处养些山草，放牧牛羊。这里用水，要到5里以外的大老峪去担。地呢？全村800多亩，不是南山背着，便是北山抱着，而且“瓢一片，碗一片，草帽底下扣一块”。每年秋上，场净地光，

那点可怜巴巴的收成，除去交租还债，还能剩啥？到头来落个两手空空，家家啼饥号寒。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救星共产党。经过减租减息，特别是1947年实行土地复查，地主斗倒了，富农失掉威风，每人分得了亩8分地。世道变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了！祖祖辈辈挨剥削受奴役的穷哥儿们扬眉吐气，挺直腰板站到太阳底下，都感到这下子可熬出头，“往后该有好日子过啦！”县政府特意给这里起了个正式的村名：沙石峪。

土地还家，当家做主。政治上确实翻了身，但是几千年留下的穷根子还不会挖掉。“有女不嫁沙石峪，石头沟岭难种地。野菜枣糠填肚皮，数九寒天无棉衣”，这首民谣，正是当时沙石峪农民生活的写照。一些中农户家底厚，劳力多，卖套放债又置地；多数贫农户，人口多，没家底，免不了东摘西借，靠出卖劳动力度日。村里有9户，穷得忍痛把分得的田地卖了，有3户穷得险些去要饭。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自己顾不了自己，更经不住自然灾害的袭击。两极分化抬头，加上自然环境恶劣，致使沙石峪从1949年开始，接连刮起“下山风”。

全村80多名男劳力，几乎有多半常年外出做工伙，宁可把家里的地亩撂荒，也要挣回点钱，好养家糊口。

共产党员刘义凤对我说：“难道咱们闹革命是为了这？你说共产党员现在到底该咋个当法？咱们到底应该咋办呢？”

我一听，他想的恰跟自己的心思合拍。可是怎么办呢？一时谁也没有办法。

1949年春季，我听领导传达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得有这么一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我这才醒过来。过去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生产建设是另一种战场啊，不是好闹的。打仗的年代，虽说出生入死，可干着痛快，任务明确，该咋办准咋办。现在虽说太平，事情千头万绪，常常不知该出哪门好。穷压着头，连召集开群众会都费劲。

青年们纷纷要“下山”，我只好反复劝阻：“别走吧，咱这再穷，总归是故土嘛！再说沙石峪不能老这样下去，事在人为，早晚得变个儿呀！”

年轻人听了只是笑：“哈哈，变个儿？土改几年过去了，可那穷还象影子一样跟着咱们。祖辈人苦熬岁月，那没法子。人挪活，树挪死。现今咱该奔平原村子去享享福啦！”说罢，一个个甩袖子离村，拉也拉不住，叫也叫不回。

气恼的时候，我也埋怨过村里群众真落后。冷静下来一寻思，错了。作为一村的党支部书记，能责怪群众落后吗？不能！问题不在群众，关键看党支部咋带领大家伙朝前走？下一步究竟应朝哪里迈？

我白天琢磨，夜里琢磨，饭吃不下，觉睡不沉，结果闹了场病。

1950年年底，我接到通知，和另外两名党员去县委举办的训练班学习。我打起精神，背上行李卷儿，一路走一路暗下决心：这一回，定要讨论清楚，今后农村工作到底咋开展？咱这插山鞋脚应该往哪儿迈？

果真训练班上了第一课，听了饶阳县耿长锁互助组的经验介绍，我心里就亮起了一盏灯。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组织起来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把农民引到互助合作的路上来，奔社会主义走。”

下课以后，人们都走散了，我还盯着黑板上写的那几行字，仔细地端详、品味。突然把脑门儿一拍：“对呀，说的对呀！”

训练班一结束，我连夜赶回沙石峪。

全村共产党员连续开了3天会。群众一个劲打听，党员只是笑不露实话。秘密真让人猜不透。

第四天早晨，东山、西山，到处响起吆喝声：开全村大会喽！

我在会上讲：“毛主席给咱们指出一条光明大道：组织起来，由穷变富……”接着从头至尾，由互助合作的好处到社会主义的美满幸福，越说越带劲大伙扬颊听着，听着，热烈鼓起掌来。

大 路 朝 阳

一宣布“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沙石峪大多数贫苦农民都打心里拥护，由穷变富，几千年来的理想就靠这个，成为现实啦。1951年春天，我带领七户贫农创办起全村第一个互助组。大家情满气盛，有农具的出农具，有劳力的出劳力，实行定工记工，互相搭套，共同劳动。大家铆足了劲，一心要从农业地里抱来“金娃娃”。

事情总不会一帆风顺，没过多久，互助组真的出了岔子。

李述山要退组不干了。

这突然的变故倒使我犯了琢磨：述山是沙石峪的苦头头，一听说组织起来，数他认路快，积极性高，为啥过些日子就变卦了呢？这里边肯定有“鬼”。

果然未出所料。李述山入组后，有个富裕中农，朝他耳根儿一个劲地叨唠，说互助合作这不好，那不好，“秋后打粮你就知道了。登上官桥哪有不掉河里的，反正允许自愿，趁早，退！有困难，我拉帮你！”李述山动摇了。

互助组开会时大伙你言我语，反复劝说李述山不要退出，让他先试试看一段，如果互助组确实不好，到时候再退不迟。

李述山口头上不好意思擦大伙的脸面，怀里却象揣起小兔子，

二心不定了。

河开化，草发芽。打春儿正该脱坯换炕的时候，互助组7户人家的火炕，总共需1600块土坯。互助组出37名劳力，3头驴，两天工夫，到山外驮土驮水，七抓八挠完成了任务。而单干户同样的劳力和畜力，四五天才勉强脱完这么多土坯。这还不算，单干户请人脱一炕坯，就象办喜事一样，全家忙乎得团团转，还得请人帮。一天三顿好吃好喝当客待，一个人顶仨人吃。“一顿悖悖，十顿喝喝（指喝粥）”，这么大破费实难招架。互助组实行以工换工，互助互济，谁也不吃谁家饭，干完活，连手都不肯洗，各回各家。李述山高兴地说：“这可真好，又省粮食又省工！”

脱坯换炕一过，我问李述山：“你家那四间破草房该修修了吧？”

述山指着房说：“早就住不得啦，一到雨天，外头大下里小下，外头不下里嘀嗒，接水都接不起呀，这些年总想翻新，不是有草没人，就是有人没草……”

我提醒他：“现在不是有人又有草吗？”

述山低头叹了口气：“唉，咱请不起工啊！”

说来说去还落在吃喝上。他竟忘了互助组不要吃喝，只是包活，“请人帮工不管饭，能行吗？”

“能行！”互助组说动就动，大伙操持一整天，石墙泥抹好了，房顶苫盖土新草，四间住房变了模样，也解除了李述山的愁疙瘩。

这年春上大旱，农历五月十三才下了三指雨。互助组人多，心齐，手快，只用四五天，趁墒抢种，白薯栽完了，大田作物出苗齐崭崭。单干户顾吹笛顾不上捏眼，等到失墒地皮干，想抢种也来不及，直到六月下旬，盼得透雨，才勉强种上晚茬庄稼。秋收一算帐，全亏了。李述山家一亩地收了180斤高粱，而跟他挨边的尹秀春一亩地只收60斤晚玉米。

互助组人多势众，不违农时地往地亩上投工投力，粮食普遍

增产，亩产量由 1950 年的七八十斤，提高到 150 多斤。李述山全家 11 口人，两个男劳力，一个女劳力，种了 23 亩地，单干时收拾不过来，每年要撂荒一部分。参加互助组的当年，粮食比单干时增收了 60%。

农民最重实际。互助组年产增收的事实轰动全村。开始抱观望态度的，点头称是，纷纷要求入组：“嘿，穷帮穷，日子红。互助组可别把我剩在外边啊！”常说风凉话的富裕户也调过脸来：“哎，人往高处走，谁不盼过兴旺日子呢！”

办起的互助组，象磁石一般吸引着周围农户。1951 年冬，《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逐级传达贯彻，经支部研究，又召开过群众大会。最后由党员分工，一个月内先后组织了 17 个互助组，有的是在农忙时节互相搭帮干农活，属于临时性的；有的是忙闲不散，始终一体，属于常年性的。

沙石峪人真往高处走了。生产搞得红火，文化状况也初步有了好转。有一首互助组歌，这样唱道：

互助组，真不差，
过好日子全靠它。
心气高，学文化，
小黑板，锄上挂，
地头扫盲赛劲大。
你教我，我帮他，
识字不误种庄稼。

仅在地头学哪够，根据群众意愿，村里成立了民校。校内夜间先生给上课，校外看物识字，墙上、缸上、柜橱上到处贴了字条，连煮饭烧灶还用柴棍儿划笔道呢。谁见了都称赞：咱这山沟沟可开了风气啦！

1951 年年末，在普遍成立互助组的形势推动下，我带头试办了全村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股经营，中农出钱，贫农

出地，再穷困的出劳力，总共 46 户，凑集土地 23 亩，200 多块钱，买了 1 头驴，14 头猪，一群羊。既可造粪种地，又能增加收入。另外还向国家贷款 200 元，开起粉房、豆腐坊。等到开春农活一忙，只顾种地，副业没人去干。粉条销不出，很快把 100 元的本钱赔了进去，只剩下 60 多块钱，合作社支撑了 83 天，最终散了伙。

群众埋怨我“败家”，一些党员也垂头丧气。原想朝近道，没成想，竟走了弯路；一心要靠“副业”起家，使山村早日脱穷，没成想倒栽了跟头！

为啥明是好心反遭失败了呢？主要是自己在执行党的政策上出了偏差。本应把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搞好多种经营，可现在只顾搞副业。忽视了以农为主，哪能行呢？

社散了之后，一度热气腾腾的小山村暂时沉寂下来。为着鼓舞士气，沙石峪党支部大力进行互助合作的宣传。

这次宣传，我既当编剧，又任导演，几天工夫，小活报剧登台。经过舆论发动，1952 年 9 月 22 日沙石峪 36 户贫下中农，把土地入了股，重新创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正月一过，农事大忙。36 户社员，宁可吃野菜，拌枣粮，也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当种籽；没有大牲口，便人拉犁，镢刨地。在集体土地上开始了第一次春耕。

1951 年冬，沙石峪成立了 17 个互助组。表面上，一个单干户也没有了。其实有个由 7 户比较富裕的中农（有的是土改后上升的新中农）组成的互助组，他们名曰互助，实仍单干。组长李永泉带领大家，从 1953 年春季，便跟我办起的合作社展开“竞赛”。

也巧，西八亩地，上半片是合作社的，下半片是李永泉互助组的。合作社种的是高粱，李永泉种的是玉米。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合作社的高粱叶子虽是齐展展的，但不如李永泉互助组的玉米叶子长势好。这是怎闹的呢？

疑团很快被解开了。

一天，天刚擦黑。李永泉的闺女述兰气喘吁吁地跑来找社主任：“我爹……他们……开了……秘密会啦，要跟……社里比……要把你们比下去呢！”

“哦，述兰，你们玉米地里到底上了多少底肥？”

“两车多！”

“你爹对外说一亩上了一车多呀！”

“白天上了一车多，夜里又上一车多，前几天又追了一次肥，怕人看见，全用上盖严了。”

我坐在旁边乐呵呵地说：“告诉你爸爸，他们跟合作社比也好，赛也好，我们欢迎！咱应战啦！”

合作社这边马上召集人开会。

我把李永泉要同合作社“比”的事一说，大家说：“比就比，看谁的优越性大！”

第二天清早，合作社集中力量，先把与互助组挨连的地，每亩追了几十驮子粪。大白天，运的运，描的描，七手八脚，飞筐舞锹，不到少半晌工夫，利利索索完工。

李永泉一见，楞了神。吹胡子瞪眼，问闺女：“这是谁给走漏了风声？”

述兰低眉笑眼，俏皮地说：“人家不傻，自己发现的呗！”

永泉不肯让步，他把全家三个劳力全吆喝出来了，一头毛驴也牵出来了。直忙得两头点灯，才把家里的粪勉强送到地边。可巧夜里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接着又连阴雨天，送到地头的粪全被冲跑。雨过天晴，合作社不但按地块趁墒追上肥，每亩还增施了30斤肥田粉。雨后苗草争长，合作社遍垅着锄。见李永泉几个中农户的农活挤疙瘩，地里草欺苗眼，想要支援他们。话传过去，永泉斩钉截铁地说：“不要！咱自己也长着两只手，要他们帮啥忙？”

秋收季节来临，合作社的庄稼堆金垛玉一般，场面都容不开。

与李永泉那个互助组开协商会，决定互派代表到对方场头监收，监打，监算。

西八亩地上半片是合作社的高粱，平均亩产 350 斤；下半片李永泉的玉米平均亩产刚 200 斤。

从全村来说，合作社平均亩产 155 斤，比上一年增长 34%；而互助组平均亩产才 120 斤。

比的结果，合作化的好处被山里人看清了！

比的结果，李永泉紧紧握着我的手：“没啥说的，我入社！”

李永泉一开口，带动其他 9 户也要求入社，其中 3 户中农。新生的农业社一下由 36 户扩大到 46 户。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了。头一年农业大丰收，社里添置了牲畜，农具，手推车。但比起邻村来，沙石峪仍然是穷。当时全村还有半数人家在观望，还要“等一等”，有些中农还没服气，还要跟合作社继续比一比。党支部、社委会没有歧视他们，排挤他们，而是积极引导他们，在生产上帮助他们。

穷要变富，而且快一点，该当怎么办？为了这个，我整天绞脑汁，憋主意。有一回，我听人说：“山区要想富，必得多栽树，要想多来钱，梯田变果园。”我琢磨：光靠增产粮食，能换回多少钱来？沙石峪哪辈子才能翻身呢？栽果树不是比种粮收效大，又省事吗？我高兴地又到外地参观一趟，心窝子更热起来。开会讲果树，下地干活想果树。

1954 年春天，社委会干部带领部分社员在长脖岭两侧的坡地一气栽下几千棵苹果和桃树苗。

谁成想，这下子可就捅了马蜂窝。

先是一个女社员堵着我家门口骂街，说种这么多树苗秋后当柴烧都没人要！有几户中农社员坚决要拔掉种在他们地里的果树。甚至发展到这边栽，那边拔。我急得团团转，只差点没作揖磕头。风波一起，几户中农闹退社。群众也好，党员也好，都议论纷纷。

我好心好意运用外地经验，借梯子登高，谁想又走了弯路。这一回我伤心透了，跟几个干部蹲在地头，急得满头大汗。为了大伙的事业，为了这些能摇钱的果树，倒熬费多少心血、力气啊。

一气之下，我几乎要甩手不干了。

妻子李述金劝我说：“哼，共产党员还怕困难么，立场坚定点吧！”

正当彷徨无主的时候，县委，区委和乡党委热情鼓励我，耐心帮我总结经验教训。

主要教训是什么呢？为群众办事，光有满腔热情还不够，还必须从实际出发，走好群众路线，蛮干不行，生产建设必须坚持科学态度。合理地有步骤地开展当前工作，让群众得到实惠，才有希望把远大理想变成现实。

在群众大会上，我诚心诚意地做了自我批评。有的社员感动得流下热泪，当场站起来说：“贵顺呀，你为我们熬红了眼，累酸了腰，可从来没哼过一声。你就算犯了错误，也是图谋为大伙早点过上好日子。你人好，心地好，这我们全知底，只是你性子急了点，咱跟不上趟。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你，合作社咋搞，还不是摸石过河么。千斤担子众人挑，再大的错儿，咱大伙为你担待了！”

听着，听着，我眼圈不由得红起来。

夜里，坐在油灯下，细琢磨群众的意见，我从内心感到：多好的群众啊，他们是沙石峪的主人，要治划这个穷山村，让它真正由穷变富，还得向他们求教问计呀！

几天的入户访贤，村里的能人把他们的“锦囊妙计”都不加保留地换掏了出来。

李树森主张在造田整地上多下功夫。

阎耀连进一步补充：“咱沙石峪的地为啥块块是青石板、乱砂窝，还不就是年年山洪冲刷，保持不了水土。我看要造田垫地，务

必在山下修田，山上栽树。水是一条龙，先从岭上行，顶上腰间发展林果，对粮食生产有利。”

从此，沙石峪坚决执行上级党委指示，尊重社员群众建议，紧紧抓住了粮食生产——关键的关键，一刻也没放松过。

1954年互助组的粮食平均亩产由120斤上升到150斤，而合作社的粮食平均亩产却由150斤上升到190斤。社员收入达到中农水平。大路朝阳，人心所向，全村农民全部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移山填涧

沙石峪自然条件恶劣，“粒上赛珍珠”。举目四望，全村一峪九坡十七沟，出门步步登山，脚下踩的竟是干岔瓦石块。地都悬在梁上，一亩地至少八九块，多则百十块。

1951年全村997亩地，是些啥样的地呢？当初李老二发现的红粘土占了一半，其它就是白砂土、黑砂土，里头夹杂大量石头碴子；土层最深的只有五六寸，最薄的三两寸，再挖就碰上山骨了。雨水一大，表土流失严重；雨水一缺，旱象随即抬头。这种地最好年景每亩只打七八十斤粮，每年国家要供应沙石峪几万斤救济粮。

沙石峪是否不要国家救济，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呢？重要的是要抱上团，敢打志气仗，拿出毛主席提倡的“愚公移山”那股子劲。

社员认为：“一天刨一镐，十天就十镐；一人一镐，十人就十镐嘛！刨它五年，十年，不愁刨不出成片的地来！”

人心齐，泰山移。社员迫切要求开发北山，党支部、社委会成员先行一步，亲自到山上做开山试验，握到指挥开山打硬仗的主动权。

天晴，雪止，工程正式开始。人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大镐抡开，铁锹叮当，一层层青石板撬起来，一处处夹缝土搜集起来。

40天工夫，人们把北山西半坡石头撬开，就地取材垒起一道道坝阶，从山下到山上平展展地叠成了73层梯田，总共43亩地。工程只完成大半，地里的土仅3寸来深，于是，又“趁热打铁”，把北山东半坡的石板撬开，把石缝的土一把一把搜出来，把西山挖出的土一筐筐担过来，垫在北山新开的梯田里，使半山梯田成行，半山石坝如墙。在当时，确实是十分壮观的浩大工程。当时人说：“北山的梯田就是从别的山上捧来的。”

打这以后，沙石峪人逐渐形成一种新风气：一到农闲季节，无论是干部、党员还是社员群众，都琢磨山区建设的新点子。移山造田，落手更重了。那原来的“瓢一块，碗一块，长条大块象绑腿带”的零星耕地，跟它们的主人一样，实现了集体化，统统变了模样。

1957年9月，沙石峪“组织起来”五周年。正当这时，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四十条”）传到沙石峪。我们认真总结五年来的办社经验，发动群众制订出提前跨《纲要》的规划。

人们回顾了前五年，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下个五年，更应该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大家说：“咱庄一没水二少土，九岭十七沟还秃着一半呢。如不拿出敢把地球翻个儿的雄心壮志，必将一事无成。”

一完秋，党支部就带领群众掀起大规模地建设高潮。向荒山开战，代价艰巨，即使开出几分地，也要花费几十个工，挖走几十座坟头似的卧牛石。全村总体奋战十几天，仅仅修出十几亩地。有人望着层峦叠嶂的九岭十七沟，心里犯了嘀咕：“凭一根钎、一把镐，东拼西撞、起早贪黑地刨啊，撬啊，啥时才能治理好这石头世界？”